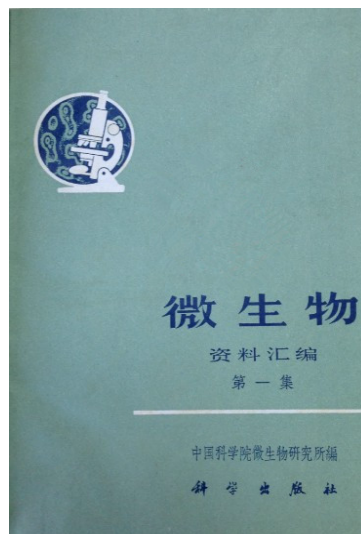


## 《微生物学通报》创刊经过

蔡泽民 程光胜

欣逢《微生物学通报》(以下简称《通报》)迎来了她的创刊40周年。作为这一专业期刊草创初期的参与者和知情者,应编辑部之约,我们就记忆所及和资料所据,介绍该期刊的创刊经过,为历史留下些痕迹,不无意义。

要谈《通报》,应该先交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这份学术期刊的前身《微生物学革命资料汇编》和《微生物资料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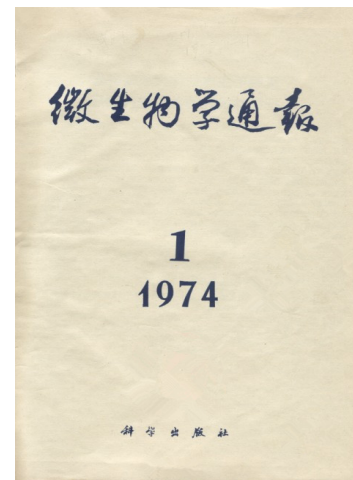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下半年开始,全国的学术期刊全部停刊,1953年创刊的《微生物学报》再次停刊(1960年至1961年第一次停刊)。但在文革期间,全国应用微生物的群众活动开展得很热闹,例如发酵饲料、杀虫菌、核酸水解产物的利用等;工厂中新产品的投产试验持续开展,例如谷氨酸发酵等。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作为国家级的专业研究机构,在推出科研成果、提供菌种、指导生产技术等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1969年在人民日报上也曾对该所有过长篇报道。为此,所革命委员会所属的科研生产组常为接待全国各地的咨询访问而应接不暇,他们自然会想到出版一些资料以便推广技术。当时科研生产组的负责人毛桂震同志在向所内助研以上的人员广泛征求意见后,又得到方心芳、张树政等原《微生物学报》的主编和副主编的赞同,便产生了出版资料汇编的计划。他和科学出版社当时第二编辑室的罗见龙、王惠君、范淑琴等编辑联系,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当时出版社虽然不能出版期刊,但书籍是可以出版的。于是毛桂震草拟了出版方案,打报告给革委会正式提出申请,得到革委会负责科研生产的魏江春首肯,便开始筹备资料汇编的出版了。

首先是筹组编辑班子,毛桂震说服了蔡泽民先生出任编辑组长兼管科技情报资料工作,又调来了门

大鹏先生。他们两人都是工作多年的科研骨干，知识面宽，文字能力强，足以胜任编辑工作，又找到在人保处工作的虞彩章女士帮助描绘插图。班子建成，便采取了 32 开本的书册形式，根据稿件的收集情况，由科学出版社不定期分集出版，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为使这个纯技术的印刷品能顺利发行，毛桂震取了《微生物学革命资料汇编》的书名。用此书名，可能和当时科学院出版《科学革命》有些逻辑关联。

编书首先要有稿件，这是开始碰到的困难。编辑组通过收集报刊、内部资料和函件等来源的有关信息，广发征稿启事，同时到一些相关单位调研组稿，逐步解决了稿源问题。他们曾到过国内许多地方组稿，同时对当地的微生物应用情况进行调查。为办好这个似刊似书的读物，他们确定每集要有水平较高的文章，重大项目要登门调研，确保无误。当时蔡泽民和门大鹏忙于组稿，审稿，改写，甚至还要亲自腾抄，既是编辑又当“主编”。在当时形势下，更担心在内容上出现政治问题，精神压力很大。这本当时非常罕见的技术性书籍，真可谓一朵“奇葩”，她既要适应革命环境，业务上还必须过硬，保证刊登的技术资料可靠。这套连续出版物以科技论文为主，也配合政治形势刊登一些与业务有关的工作总结，每本书的首页则必须是毛主席语录。为体现革命精神，他们把几十年形成的原来的那些千遍一律的写论文格式完全破除，只用二级或三级标题。这样，文风显得更活跃，也更利于一般读者阅读。就这样，1970 年起，这个资料汇编便应运而生了。到 1972 年，共出版了 9 集，此时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这些资料集实际是科技出版物，便把原有书名中的“革命”二字去掉，成为《微生物资料汇编》。接着又出版了 6 集，到 1973 年《微生物学报》复刊，临时出版的资料汇编便停刊了。

《微生物学报》复刊后，蔡泽民和门大鹏自然成了编辑，后来又正式将虞彩章调到编辑组，负责绘图及一些行政事务。这时编辑部收到的许多实验报告、技术改进论文及科普资料，很值得交流，因为那时学术期刊很少，作者们自然把它们投向了刚刚复刊的《微生物学报》。然而有些文章并不适宜载入学术性很强且对国外发行的《微生物学报》。于是蔡泽民等便产生了创办一个相对普及性刊物的想法，这就是《通报》创刊的直接动因。经微生物所科研生产组同意，呈报所党委批准后，报呈有关主管部门批复，决定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邮局公开发行，1974 年初《微生物学通报》便问世了。



作为编辑组长的蔡泽民先生一手操办了《通报》的创刊。他转托中国科学院党委宣传部一位年轻干部(忘记了他的名字)，请郭沫若院长题写了刊名，遗憾的是这份名人手迹交科学出版社制版后编辑部没有收回，乃至现在其下落不明。

关于《通报》编委，毛桂震拟了名单报所党委审定，微生物所有阮继生、王大耜、李钟庆、刘肃、余茂效、孟广震、陈琦、郭扬。除微生物所的编委外，还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北京生物制品所、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北京大学生物系、华北制药厂、中国农林科学院土肥所、湖北省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及兰州兽医所等单位各聘请了一位科研人员。遗憾的是当时刊物上都不刊载编委会成员姓名，而有关档案又在搬迁过程中散失，年代久远，外单位的编委姓名一时无法找齐。笔者记得起来的有王用楫、钱存柔、郑幼霞、单慰曾等。《通报》编委会成立后，编辑工作由

郭扬女士(已故)分管,后来郭扬调出,由樊洪业先生接替。随着科研体制的不断调整,40年来通报负责人也已更替多次,担任过编辑的人不少于10人。

《通报》的主编,经我们广泛了解,第一任应该是阮继生,在创刊初期与他联系较多。以后历任主编有王大耜、王修垣、何忠效、赫荣乔。

《通报》以刊载微生物应用及其应用基础研究和科普为主,开始出刊时承续了原《汇编》未及刊发的稿源,1974年为季刊,1978年为双月刊,2008年扩充为月刊。除篇幅日渐扩增外,文章的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通报》的40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微生物学4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蓬勃发展。

回顾我国以微生物学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发行史,从1938年朱宝镛创办的中国酿造学社社刊开始,到今天的多种杂志中,唯一连续出版发行40年的,就是《通报》了。

今天的《通报》,已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优秀综合性学术期刊,年发稿量超过200篇,发行范围遍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美国《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PЖ)、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NKI)等多家检索机构收录,并将创刊40年来的所有论文全文上网。2013年更是因在国内“微生物、病毒学类”期刊中综合评价总分列第一名而获得“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奖”(引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数据)。

我们和已经离开岗位的几代《通报》编委和编辑们一起,祝愿《微生物学通报》越办越好,伴随着祖国的日益强大繁荣,成为向全世界同行们展示中国微生物学工作者创新成就的一个受人关注的窗口。

